

# 收缩性发展:应对乡村社会转型的基层治理创新

陈 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针对人口结构性外流、乡村生活主体缺失的收缩型乡村,治理的核心要点是维持在村群体的生活活力并创造发展潜能。收缩性发展的理念提供了应对乡村社会转型的乡村治理创新目标和原则,有助于对乡村治理的重心进行锚定。在客观认识乡村社会收缩的客观规律和阶段性特征的前提下,通过维持在村人群生活循环、发展高质量小农经济、构建低耗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涵养乡村共同体文化等方式,可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培育内生动能。以收缩性发展原则来衡量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基层治理实践的成效,有助于建构应对乡村社会转型的治理体制,为因地制宜开展基层治理创新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收缩性发展;乡村收缩;社会转型;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24)06-0092-11

DOI:10.14110/j.cnki.cn-37-1059/d.2024.06.006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基本内容,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三大重点之一,提出各地要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广“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千万工程”的特色之一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当地特色的乡村振兴方案,做到“千村千面”、避免“千村一面”,因此也就是要依照各地乡村实际情况开展乡村治理创新,因地制宜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中国地域差异较大,乡村发展阶段不同,乡村治理的实践习惯存在差异,因此,处在国家治理微观层面的乡村治理不可能存在“一张试卷”和“标准答案”,对乡村进行类型学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乡村有效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助于构建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治理理念和政策选择。当前学界已经从不同维度开展了乡村社会类型和治理差异的研究,如贺雪峰从东西区域差异角度分析了乡村治理的资源基础及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地区县域富民产业培育与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3BSH107)、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西省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F015)、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科助优项目“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520243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 靖,男,社会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

其结果<sup>①</sup>,刘成良认为东中西不同发展区域存在治理要素上的不同<sup>②</sup>,杜鹏提出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存在适配上的不同结果<sup>③</sup>,因此也就形成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创新路径差异<sup>④</sup>。从区域视角的类型化方向进行尝试,有益于推进对我国千差万别的乡村状况的认识,有益于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提高基于因地制宜原则的政策科学性。但在区域视角外,有学者也发现,城镇化发展水平也会造就不同的乡村社会类型<sup>⑤</sup>,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样一种类型,即在一些人口净流出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人口结构性外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过程<sup>⑥</sup>,乡村出现了人口结构失衡、产业衰落、社会文化断层危机。“空心化”<sup>⑦</sup>、“空巢化”<sup>⑧</sup>、“过疏化”<sup>⑨</sup>描述了乡村社会转型的不同层面,也隐含着对乡村发展前景的方向判断。笔者认为,以上描述均含有一种衰退假说并将乡村社会转型视为一种危险,忽视了“危机”一词所蕴含的机遇面向。因此,本文提出乡村收缩和收缩性发展的概念,用“收缩”这一中性词来描述乡村因人口结构和总量的变化所导致的收缩状态和阶段性特征,旨在指出一种乡村经济社会演变的过程,并基于部分地方应对型政策实践来总结提炼收缩性发展的分析框架,以丰富对乡村振兴多元路径选择的认识。乡村收缩是对当前乡村经济生活所处的结构性、阶段性转型状态的描述,而收缩性发展则是指乡村在经历收缩过程中出现的自主性调适,以及其中蕴含的内生增长路径。

## 二、乡村收缩:历史与理论

从人口规律来看,当前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业型乡村均出现了收缩现象,表现为乡村人口结构性外流以及支持乡村基本生活的人口基数下降,进而导致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衰解以及乡村公共政策体系的重构。应当承认,在城镇化牵引的人口流动大趋势下,乡村人口结构性调整已是客观事实,这不仅是国际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也是较长时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基本趋势。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一是要避免在高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可能出现的衰败命运,二是通过振兴乡村来保留足以容纳在村人口的物质社会基础。这种逆势调节的尝试在国际上亦有先例,但中国实践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 (一)“终结论”“衰退论”与“收缩论”

乡村变迁是城镇化过程的伴生物。人口从乡村向城镇流动与集聚引发了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动,也引起了作为社群单元的村落的变迁。费孝通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看到了以财富和人才离乡为特征的乡土社会的“损蚀冲洗”<sup>⑩</sup>,李培林则基于“城中村”现象看到了城市吸纳所带来的“村落的终结”<sup>⑪</sup>。村落

① 贺雪峰:《东西中国:中国区域差异的经济视角》,《开放时代》2023 年第 2 期。

② 刘成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差异与转型路径》,《理论月刊》2023 年第 4 期。

③ 杜鹏:《中国乡村治理创新的区域差异》,《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

④ 桂华:《面对社会重组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政治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

⑤ 刘华芹:《类型学视角: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分化和乡村振兴重点》,《河北学刊》2019 年第 1 期。

⑥ 朴光星、马文婷:《跨越收缩:东北人口减少县域转型发展的个案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24 年第 2 期。

⑦ 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及整治实践》,《地理学报》2009 年第 10 期。

⑧ 马良灿、康宇兰:《是“空心化”还是“空巢化”?——当前中国村落社会存在形态及其演化过程辨析》,《中国农村观察》2022 年第 5 期。

⑨ 田毅鹏:《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6 期。

⑩ 费孝通:《乡土重建·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北京: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 89 页。

⑪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终结论”引发了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现代命运的讨论。部分研究者并不认同“终结论”<sup>①</sup>,认为“终结论”对“终结”的定义不清,“城中村”案例过于典型,蕴含着悲观论色彩,从而提出了一种“衰退论”的解释。

“衰退论”的重点是描述和阐释市场化、城镇化以及地方政策驱动下的乡村衰退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指出乡村结构变迁的客观现实,认为衰落是由外在力量引起的,而乡村则成为了问题的“集中器”。如有学者针对引发乡村衰退的政策扭曲、资本挤压等展开批判<sup>②</sup>;也有研究依托现已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战略”等逆势调节实践,提出了对“衰退论”的经验反证<sup>③</sup>,指出乡村内发型发展的路径<sup>④</sup>。总体来说,“衰退论”暗含了一种单向演化观,以“化”来解说乡村衰落过程,实际上蕴含着目的论的色彩,不可避免地带有唱衰乡村的文化凝视。笔者认为,应当以去意识形态化的眼光去客观描述乡村转型的状态和属性,进而才能提出积极的、发展性的和乐观主义的应对政策。

本文主张以乡村收缩来描述当前乡村所面临的客观转型,并不必因出现了人口流动就宣称乡村迈向了衰退,不必去声讨引发人口流动、村落疏散的城镇化与市场化等外在力量,也不必以悲观主义眼光评判乡村不可避免转型所带来的诸多社会现象,而是基于已置身在动态变迁中的乡村社会结构的节点上看待乡村出现的收缩过程,看到危机中的机遇与方向。

## (二)日韩乡村的收缩过程

收缩一词多适用于城乡空间规划领域,如为应对逆城市化进程,西方提出了以“精明收缩”理念开展空间规划,而乡村收缩则最先被用以描述日韩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衰落状态。日韩的乡村收缩作为一种城市化的伴生过程,表现为人口总量的持续减少,最终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引发从硬件到软件再到思维的向下负向螺旋。

日本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集中讨论乡村日益严重的人口剧减、老龄化和“过疏化”现象,乡村收缩则集中表现为人居空间的荒废、公共基础设施的压缩、经济产业的衰败等现象,对乡村社会的物质基础带来极大挑战。需要指出的是,国内使用的“过疏化”一词就直接来自于对日本学者的引介,指的是因人口流动而导致乡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数不足现象<sup>⑤</sup>。乡村的收缩直接导致政府公共服务因缺乏支撑而难以落地,市场服务也因人口密度不足而无法展开,从而出现了“有秩序的撤退”与“生产和生活机构的崩坏”<sup>⑥</sup>。日本采取了一系列调适行动来应对乡村收缩,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通过“一村一品”“第六次产业”“地方创生”等政策开展产业振兴和造村运动。韩国的乡村收缩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其在高速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28.0%快速提升到2013年的91.04%,客观上导致了乡村人口的收缩,邑面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从20世纪70年代的58.8%快

① 田毅鹏、韩丹:《城市化与“村落终结”》,《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樊春明、朱启臻:《村落的终结还是纠结——文献述评与现实审视》,《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6期;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53页。

② 张玉林:《大清场:中国的圈地运动及其与英国的比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王露璐:《资本的扩张与村落的“终结”——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逻辑及其伦理反思》,《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5期。

③ 刘永飞、徐孝昶、许佳君:《断裂与重构:农村的“空心化”到“产业化”》,《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④ 吴重庆:《超越“空心化”:内发型发展视角下的县域城乡流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⑤ 田毅鹏:《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⑥ 张立、李雯骥、白郁欣:《应对收缩的日韩乡村社会政策与经验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22年第3期。

速降至 2015 年的 18.4%<sup>①</sup>。为此,韩国也应对性地开展了“新村运动”“企业型新农村建设”等运动<sup>②</sup>。但总体说来,日韩在应对乡村收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收缩是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演变的必经过程,政策实践无法扭转乡村收缩的宏观趋势,各种逆势调节也无非是缓解过疏村落变迁的力度。在认识到这一客观规律后,各种逆势调节的政策发力点就在于营造乡村的活力,而非开展空间建设和导入人口。日韩应对收缩的诸多规划实践中,以小城镇作为乡村地域联结的节点重塑城乡互动关系,以中心地开发来重构生活圈、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的做法值得借鉴<sup>③</sup>。已有的中国乡村规划研究中,学者们借鉴收缩、精明收缩等概念来评判当前因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地理变化,并提出将“精明收缩”理念运用于新农村建设、乡村规划和国土整治等政策实践中<sup>④</sup>。规划视角的收缩多关注人口和物质空间表现出的不可逆转的变迁,因此重点就放在如何通过合理配置空间等要素资源,特别是对乡村地域空置和荒废的人居空间进行合理处置,发挥空间的集约化利用效益,吸引人口回流以缓解收缩过程。

### (三)中国乡村收缩

引发乡村收缩的首要因素当然是人口,乡村收缩的最直观表现就是乡村人口的总量下降与结构失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0979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36.11%,与 2010 年相比减少了 16436 万人<sup>⑤</sup>。而结构失衡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青壮年的大量外流和在村人口的老齡化程度加剧,这意味着作为乡村核心生产要素的农业劳动力的总量在逐渐减少。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过去 20 年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加速减少,“十三五”期间每年减少 1300 万,同时农村劳动力老齡化日益加重,2018 年的数据为 13.8%,相比 2000 年增加了 6.5 个百分点,并高出全国老齡化率 1.8 个百分点<sup>⑥</sup>。应该看到,乡村收缩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客观结果。城镇的扩张和乡村的收缩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但乡村人口的结构变动是伴随着城镇化牵引的人口流动、全国人口老齡化以及生育意愿下降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产生的,引发乡村收缩的动因是动态变化的,必须以我国整体社会收益来衡量城镇扩张与乡村收缩的效果。

从人口维度来看,长期以来人多地少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我国形成了乡村人口规模与有限可用资源之间的矛盾,人口“过密化”反而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头等障碍,转移过剩劳动力则成为近代以来推动乡村发展的共识。从走出“过密”到“空心化”的演进中,乡村收缩是一个必然需要经历的过程。只不过由于我国各地城镇化步伐快慢不一、乡村产业基础不同,因此乡村收缩程度也粗略分成低度收缩、中度收缩和高度收缩三种形态。从收缩阶段来看,并不是说只要出现人口外流就值得担忧,也不是说乡村人口结构以及农民家庭结构不完整就一定导致问题丛生。只有学界所担忧的“过疏化”属于过度收缩造成的畸形发展形态,是需要真正被作为问题积极应对的阶段。

当前规划视角的收缩存在着“只见空间不见人”的问题,乡村“空心化”研究也大多关注土地、房屋和空间,而不以乡村社会为分析起点和政策落脚点。乡村收缩虽然以人口流动为肇因,但乡村收缩结果则是多维度的,表现在经济发展、生活环境和文化空间等多个层面上。本文所讨论的乡村收缩概念并不

① 张婧:《日本一村一品运动走向世界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日本问题研究》2019 年第 5 期。

② 周娟:《韩国农业危机及其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15 年第 3 期;沈权平:《韩国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起源、演进及政策路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

③ 田毅鹏:《东亚的村落空洞化及其社会政策回应》,《宁夏社会科学》2023 年第 6 期。

④ 赵民、游猎、陈晨:《论农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导向和规划策略》,《城市规划》2015 年第 7 期;焦林中、张敏:《收缩乡村的空度成因与精明收缩规划策略——基于豫东典型乡村的田野调查》,《经济地理》2021 年第 4 期。

⑤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https://www.gov.cn/xinwen/2021-05/11/content\_5605791.htm。

⑥ 谢玲红、吕开宇:《“十四五”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五大问题》,《经济学家》2020 年第 10 期。

同于规划领域所看到的空间收缩,也不仅仅指向人口总量与结构的收缩,而是在社会收缩这一宽泛意义上描述当前乡村的基本形态。从区域上看,中西部地区因产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程度的限制,农业人口结构性外流以及乡村收缩的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从乡村社会内生发展需求看,人口外流本来也是农民家庭寻求最大化家庭收益以及乡村社会主动寻求“减量化”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当前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经营格局以及“半城半乡”代际分居格局均是社会收缩在家庭层面的表现,而“老人农业”、村社内部流转等经营形态则是其在经济上的表现。因此,本文将人口、经济、社会层面的收缩统一纳入乡村收缩的范畴来进行分析,就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三、收缩性发展的分析框架

如果将城市扩张与乡村收缩视作中国城乡发展的一体两面,乡村社会从“过密”状态中走出的过程本身就是收缩,人口减少也会带来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以及促进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人类聚落的收缩并不必然带来“退化”这一悲观的后果,如何在收缩中寻求发展,进一步实现利益整合和资源优化配置,化解收缩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和矛盾,使得乡村在重塑与整合的路径上迈向善治,是探讨未来乡村发展道路的前提。

#### (一)收缩阶段与乡村发展类型

由于我国乡村聚落形态多样、地理条件差异较大、产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乡村收缩的程度及其所处的阶段便不尽相同,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采取的方式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如果以未受外在力量牵引的“完整”人口作为乡村收缩的起点,那么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吸引,乡村将从人口外流开始经历收缩初期、高速收缩期、收缩后期,最终走向可能的消亡。如果从人类聚落特别是城市的“扩张—收缩”规律来看,社会收缩会有“四个阶段、两个拐点”<sup>①</sup>。笔者受城市收缩研究的启发,将“收缩阶段说”放在乡村收缩进程中,发现乡村也服从“扩张—收缩”的基本规律,存在“扩张—收缩”拐点和“收缩—扩张”拐点(如图1所示)。针对乡村收缩的阶段特征,当前乡村振兴实施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政策等软件建设均应有针对性地进行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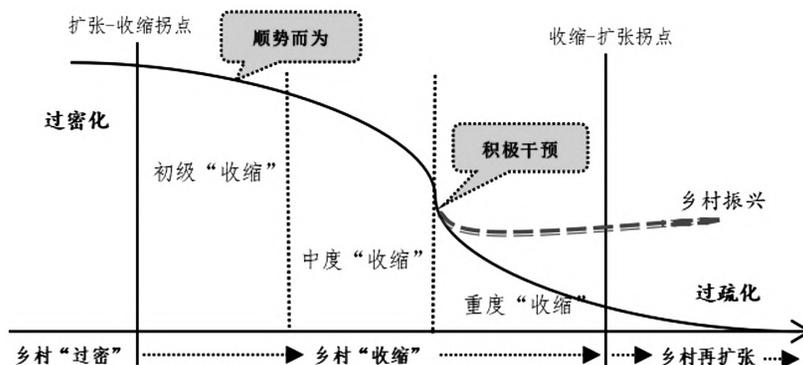


图1 乡村“收缩”的发展阶段与治理干预契机

应看到,在“扩张—收缩”拐点上,在工业化、城镇化牵引之下,乡村劳动力将追求更高的生产性回报,农民家庭将开展劳动力优化配置,乡村的收缩由此展开。在乡村“过密”的基础上,从“扩张—收缩”这一拐点来观测乡村发展的阶段则会发现,收缩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发展的表现,顺势而为地推动人口流动以参与全国劳动力市场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政策目标。而在人口外流和乡村社会调适的双重互动机制

<sup>①</sup> 章昌平等:《收缩的挑战:扩张型社会的终结还是调适的开始?》,《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4期。

下,乡村内部会形成一定的均衡,表现在留守群体能够依托土地、区域市场、公共服务和社会网络保持完整的生产生活循环,与外出的家庭成员紧密联系并有机互动,形成稳定均衡的协作关系。而“收缩—扩张”拐点则意味着当城乡之间经济收入、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能够基本相持,农民就可以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形成抉择,此时乡村“扩张”将具有可能。当然,城乡相持地位的形成除了受到影响城乡收入水平的市场因素作用外,还受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融合发展和返乡激励等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

## (二)收缩性发展与政策干预

从乡村收缩的过程看,“扩张—收缩”阶段的政策干预应以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为主要目的,具体做法是消除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制度限制,促进劳动力市场中的要素优化配置,创造农民进城安居的政策环境。应该看到,经过多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发展,目前我国已经走过了“扩张—收缩”拐点。从乡村内生视角看,农民家庭通过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配置获得最大家庭收益以及代际合力实现“渐进式城镇化”<sup>①</sup>,是乡村初级收缩阶段农民家庭、乡村社会主动寻求减量化而实现的收缩性发展。当前很多中西部乡村已经步入以“过疏化”“空巢化”为特点的重度收缩阶段,人口规模较小的乡村会由于维持基本生活的公共服务、市场服务的人数不足而造成生活不便,进一步导致在村人口持续外流。在乡村人口趋向“探底”情境下迈向乡村的再扩张,以乡村振兴为抓手的积极干预必不可少,因此这一阶段的收缩性发展就是在直面乡村收缩的客观事实基础上,以优化乡村生活和塑造潜力结构为发展路径,经过应对性政策的干预介入,为“收缩—扩张”拐点的到来创造市场条件。

## 四、应对收缩:收缩性发展的基层治理创新

收缩性发展是在乡村收缩的客观背景下反思“完整”乡村的假想,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与治理的调适中探索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须直面乡村收缩和逆势调节的限度,并在此判断的基础上践行收缩性发展的理念。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将进入“下半场”,“下半场”的核心任务是如何使“上半场”脱离乡土的大量流动人口重新落地扎根<sup>②</sup>。而在大部分步入中度收缩乃至重度收缩的中西部乡村,如果能够在明确乡村收缩的发展前景之下实施积极有效、适度前瞻性的政策干预,无论是使流动人口重归乡土还是支撑城镇化扎根,都可以化消极“衰败”为积极收缩,以收缩性发展助推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

### (一)收缩性发展的行动框架

从整体上看,当前大部分乡村收缩的过程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市场驱动下的外出务工和教育与婚姻城镇化牵引的进城买房,经历收缩的乡村会面临内部与外部的四重主体行为与作用(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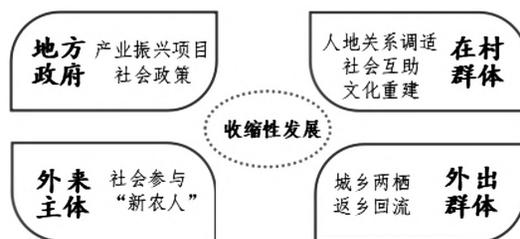


图2 “收缩性发展”中的多元主体互动

一是地方政府的作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连续体中,国家以逆势调节的姿态

<sup>①</sup>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sup>②</sup> 焦长权:《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积极应对乡村可能出现的“衰败”。一方面持续向乡村投放财政支农资金,通过产业类项目投入的方式重塑乡村经济格局,以实现在走出“过密”人地关系基础上的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民生类项目来提高乡村生活的便利程度,为弱势群体提供兜底型社会政策保障。

二是来自外部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力量。如一些地区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造“新农人”等方式培养了扎根乡村的产业主体,还有一些地区依托社会组织开展乡村建设、文旅开发等重焕内生发展动力。

三是来自乡村内部的留守群体的力量。在走出“过密”之后乡村内部资源的紧张结构得以纾解,于是出现了多种产业形态和产业主体,它们成为担负产业振兴的本土骨干力量。通过社会内部再组织化和各种非正式的民间互助互惠而使得社会互助得以发生的文化根基,正是乡土社会内部的熟人网络与共同体文化。

四是乡村外出群体的作用。我国渐进式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种“城乡两栖”现象,即人口近域流动以及就近城镇化模式下外出人群总是与本乡本土保持着紧密联系,呈现出一种在迁出地和迁入地来回流动的非永久性迁移现象<sup>①</sup>。这部分两栖者是城乡生活互动的链接者,也是使乡村保持内生发展潜力的积极参与者。

总之,虽然乡村收缩过程中人口总量在下降,但多元主体围绕收缩产生了各种新型互动方式,社会关系得以重塑,因此乡村并不是处于单向度的“衰败”过程中。而面对引起收缩的各种动因,乡村社会内部也并不是被动等待衰败和消极走向“空心化”,而是通过各种地方自主性实践来使乡村重焕发展潜能。这些看似琐碎但形态多样的地方探索中蕴含着收缩性发展的一般路径,在笔者开展的多地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多元主体互动的行动框架下,收缩性发展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成为指导乡村走出“终结”与“衰败”迷思的积极政策方案(参见表1)。

表1 乡村收缩案例与收缩性发展的尝试

典型案例	亮点做法
皖东 E 镇	小块并大块、“一村一品”产业工程、村级集体经济联营、小龙虾品牌创建
皖北 J 镇	B 村“小田并大田”、W 村老人助餐点、L 村道德积分制、农民体育文化节
豫东 P 镇	D 村“孝亲饺子宴”、H 村蜜瓜产业园、J 村“小方并大方”
鄂中 F 镇	村庄互助养老院、返乡群体代工车间
黔东 C 镇	扶贫车间建设、保留村级教学点、村级产业示范项目
滇中 Z 镇	特色集镇建设、阿妈议事会、“一村一品”产业强镇项目、村级集体经济“联合抱团式”发展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2019—2023年在多地实地调查的数据与质性材料整理而来

## (二) 收缩性发展的实践案例与政策要点

乡村发展的微观实践中,一些地区积极主动地应对本区域内出现的收缩现象及突出问题,摸索出诸多有助于实现收缩性发展的实践方案与草根政策,不仅使得人地关系纾解后乡村土地与劳动力得以优化配置,实现了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而且为在村留守群体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政策环境,且为乡村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弹性空间。

### 1. 保障在村群体的生产生活循环

当前大部分中西部地区乡村已经达到中度甚至重度收缩阶段,人口的大规模外流导致乡村出现“过疏化”,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成为居住在村的主要群体。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不完整的条件下,乡

<sup>①</sup> 王春光:《第三条城镇化之路:“城乡两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村老年人将依靠乡村资源和乡村社会网络完成自养,村级治理“硬任务”消失的同时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乡村社会呼唤一种针对日常生活的治理体系。从政策层面上看,在村群体的美好生活实现本身就是治国理政新理念和基层治理的新任务,如果人们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小事”不好办或办不好,将严重削弱人们的公正感和公德心。而生活治理就需要通过解决留守在村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关键小事,促使其在村落社会熟悉的、健康的、有序的日常生活秩序中安置身心,实现在乡村的安身立命。

皖北 J 镇 J 村的村社组织通过应对老年人关心的关键小事,以助餐服务解决部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更重要的是营造了村社内助老爱老敬老的道德环境。老年助餐点运营后, J 镇充分利用微信群、广播会等方式,线上线下同步宣传老年助餐点运营情况,提高居民对老年助餐服务暖民心行动的知晓度和参与度。结合助餐服务, J 镇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为老年就餐群体提供打包、分餐服务,进一步提高老年群体就餐的舒适感和满足感。豫东 P 镇通过周期性举办的助餐活动,同时搭载其他文化活动,营造了一种“庙会化”的老年活动,进而塑造了村落的共同体感。豫东 P 镇 D 村则将“孝亲饺子宴”活动扩展成为了以养老活动为中心的村庄节庆仪式,所有老年人都愿意参加,普通村民则来当志愿者,村级组织也以此开展村民集会和宣传活动,以助老为基础撬动了村庄整体参与的积极性。

## 2. 着力打造乡村产业发展的弹性结构

实现收缩性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乡村“过密化”的人地关系紧张格局得以纾解、传统村庄产业结构出现调整的契机,而基层农业治理中的政策选择影响着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了产业作为基础,乡村才留得住人、引得回人。收缩性发展实践中需利用好乡村内外部有利条件,打造乡村产业发展的弹性结构,既解决好当下在村群体的生计满足问题,又要为进一步的乡村发展提供弹性空间。

首先,乡村内生的产业主体应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力。目前乡村人地关系大大纾解,乡村存在着依靠家庭经营的小农户,也培育了部分通过民间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同时也有部分“新农人”通过下乡投资、返乡创业的方式来到乡村。如豫东 P 镇在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支持下创建了特色经济产业园, D 村、H 村以蜜瓜产业为抓手积极培育“新农人”,一批 40—50 岁年富力强的留守农民积极创业,成为本村蜜瓜产业发展的带头人,也逐步成为参与村级治理的骨干力量,从而有效化解了乡村收缩造成的中坚农民流失问题。

其次,在国家支农政策持续加大对农投资力度的背景下,以乡村为单位的经营空间已经显露。在乡村普遍收缩的背景下,多个乡村开展联营正当其时。如黔东 C 镇开展的乡村联营模式有效解决了落地在村、画地为牢的困境,实现了乡村集体经济的合股。一些地区借助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村庄产业经营,以村庄产业谋划为先,借助国家扶持政策开启了村庄特色产业规划,选择能够顺利落地、实现最大化社会效益的产业项目。又如滇中 C 镇当前正处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阶段,政府通过村级集体经济力量来发展产业,以每个村 20 万元扶持资金的方式扶持 10 个脱贫村搞“一村一品”建设。

再次,在乡村资源结构重组的条件下,一部分外出青年选择返乡创业,延续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如皖北 J 镇各村均有少数返乡青年创业的案例,他们大部分选择以自家土地、房屋等生产资料为基础,借助乡土情谊与熟人社会网络,拓展当地的产业发展空间。返乡创业方向选择上倾向于从事新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涉农产业,依赖父辈家庭和村社关系开展经营。在鄂中 F 镇的调研发现,2019 年之后该镇共成立了 6 家代工厂,都是返乡创业者开办的以电子配件、服装制造为主的代工点,满足了在村留守群体的生计补充和技能训练需求。

最后,结合以高标准农田整治工作等具体途径,皖东 S 镇、豫东 P 镇 S 村、皖北 J 镇 B 村等通过“小田并大田”“一户一块田”等实践完成土地去细碎化工作后,无论是小农户、“中农”还是“大户”,种地都更方便了。这是一项具有政策弹性的尝试,能够为未来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提供先决条件。

### 3. 实现乡村低成本、高效益的有效治理

在收缩性的乡村地区,由于人口基数难以维持饱和的治理事务,因此村级治理体系的建构基础就是回应在村生活人口的治理需求。这样的治理体系应当是低成本的,治理原则应当是“守夜人”式的,治理主体应来自于乡村内部而非单纯依靠返乡者、新乡贤以及下派干部等。处在收缩过程中且将长期维持收缩趋势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任务是兜底,不宜采取激进的、高成本的治理手段。

有效的治理应当是基于乡村内生秩序的简约治理,借助有效的生活治理机制来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如滇中C镇多个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让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以阿妈议事会、院坝会、火塘会、田间说等方式,重点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焦点问题开展基层协商。村社是最靠近村落社会和在农村群体的组织层级,是最适合回应收缩性村落中群众常发的、琐碎的、细微的生活小事的层级,加强村社的回应能力,可以将村级集体经济与治理事务结合起来,以治理绩效来考察村社的集体功能,而非单纯以收入数字来衡量。

### 4. 以文化治理来涵养村落共同体文化

日渐“空巢化”的村落社会中,如何保存留守群体所习惯的生活节奏、文化习俗和情感体验方式,是基层生活治理需要直面的问题。在社会化进程中,我国各地乡村形成了不同的内生性道德规范和文化风俗,在人口基数逐渐不足的情况下,一些仪式无法举办、一些道德观念开始缺乏约束,生活在村的农民已无法充分享受村庄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满足感。对此,一些地区探索实行了道德积分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村落道德的表彰力和动员力,让留守群体生活在熟悉的文化氛围中,建立村史馆以唤起村民的集体记忆,塑造村民的共同体感。如皖北J镇所探索的道德积分制通过积分方式助推文明乡村创建,激励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L村建立的“电力爱心超市”通过利用政府投资、村集体列支、爱心人士捐资等方式积极筹措资金,为工作常态推进提供了财力保障。豫东P镇D村通过创建村史馆,以“传承过去,珍惜当下”为主线,真实呈现了从一穷二白到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的发展历程。

与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相对,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也需要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其中乡村文化广场、文艺活动用品等均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项目建设,一些生活小事所需的基础设施也应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如回应村庄红白仪式活动所需要的场所与器具、红白理事会的组织建设等。生活性的公共物品应包括文化下乡、创办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等,充实农民的日常生活。文化治理就是要通过软性的方式浸润人心,唤起村落传统价值观念,让在农村群体获得情感共鸣,其中节庆仪式的方式不仅活跃了乡村文化生活,也提高了邻里之间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公共生活的氛围,涵养了传统乡土文化。在乡村持续收缩趋势之下,这种公共生活的塑造直接为乡村保留了活力,也使得在农村群体获得关注,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乡村建设与发展中,增强了乡村发展的软实力。

## 五、消极衰败还是积极收缩?

收缩性发展的目标并不是去重构完整的乡村,而是在城镇与乡村和谐互动辩证关系下控制乡村的收缩力度,避免出现乡村的失序。上述来自基层社会积极主动的治理探索,为实践收缩性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经验样板,因此应积极应对乡村收缩并在收缩性发展理念下打造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通过人地关系调适来塑造乡村产业发展的潜能结构,以文化治理、生活治理来回应在农村群体的美好生活。

### (一) 收缩性发展与乡村发展观念调适

#### 1. 积极应对乡村收缩

与村落“终结论”“衰败论”不同,收缩性发展强调客观认识乡村收缩的历史过程和阶段性特征,在合适的收缩阶段和恰当的契机中积极应对乡村收缩可能遇到的“衰落”,建构基于积极收缩的乡村发展

观念。我国乡村收缩主要是由城乡关系下城市更高效生产生活模式所牵引的,东部地区相对较弱,而作为人口净流出地区的中西部地区则程度较高。我国的乡村收缩规模巨大,且在渐进式城镇化模式下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仅寄希望于通过乡村振兴解决普遍的收缩问题,回归到完整乡村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同时也不能阻止乡村积极有序的收缩。因此,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就需要从发展观念上摒弃“衰败说”,防止“完整乡村”假想,变消极悲观为主动顺应和积极应对。以收缩性发展为导向,应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基础上,通过引导与加强自下而上的治理来努力改善生活质量,积极回应人口减少与乡村社会收缩的客观现实。

## 2. 建构与收缩性发展相匹配的治理机制

乡村收缩支撑了城镇扩张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历收缩的乡村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大后方。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国家大量的惠农资源持续投入,而实现收缩性发展就需要通过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机制以避免资源的错配,依靠精细的规划与治理促进村民生产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就治理机制而言,迫切需要吸纳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搭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治理平台,以在村群体为收缩性发展的基础性行动力量,结合外出群体的乡愁纽带和返乡实践,以家庭和村社为纽带建立有主体的熟人社会。同时各类市场和社会等外部力量也是推动收缩性发展必不可少的辅助力量。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乡村振兴各个目标任务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需要在积极迎接外部要素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引导促进政府干预力量与基层内生动力的耦合,在政府赋权的同时因地制宜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实现进一步的、积极的、有效的收缩治理。

### (二) 应对城乡生活治理的收缩性发展

#### 1. 以收缩性发展构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

当前乡村正在迈向重度收缩阶段,虽变迁速度快、烈度强、向度广,但仍无法断言“村落的终结”。在收缩的同时,乡村也蕴含着丰富的发展之源,这是我国社会活力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坚韧”的社会底色。小农社会的韧性根源于小农户的韧性。韧性小农,是指小农户虽有其脆弱性的一面,但更有顽强的生命活力,表现为一种具有内在发展动力,能够灵活适应外部环境,不断吸纳外部能量,从而实现再生和延续的韧性<sup>①</sup>。小农户可以积极推动人地关系的调适,逐步成长为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这样既能够保证土地不撂荒,还能够保障粮食安全,使在村群体获得体面的生计,使得“过疏化”的趋势得以延缓,从而为乡村提供充足的内生发展主体。因此,维持并发挥韧性功能,对推进收缩性发展具有支撑作用,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亦极为关键。

#### 2. 以收缩性发展塑造中国城镇化的韧性

城镇化牵引之下,农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的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在城乡之间的分居已经成为常态,在本地城镇化的实践模式下,城乡之间流动的“两栖”群体也是乡村发展的关键主体。收缩性发展路径下,应保留“两栖”群体往返城乡的制度途径和产业空间,接受农民家庭在城乡之间分居所产生的暂居现象,同时创造充分条件保证县域“两栖”群体能够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两栖”群体是处在渐进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普遍出现的新现象,该群体的存在也使得城乡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关联与互动,保持城乡关系的紧密连带和深刻互动,对思考城镇化“下半场”中乡村振兴、乡村产业发展与村级治理尤为必要。

#### 3. 以收缩性发展为基础,使乡村持续为我国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作贡献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城镇化进程中,农业与农村为城镇化作出了四重贡献:一是提供了充足的劳动

<sup>①</sup> 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力,为城镇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后备成员;二是提供了质优价廉且稳定供应的农产品,使市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三是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后盾,农业不仅为进城闯关失败者提供了兜底保障,而且还为“半城半乡”的进城家庭提供了物质与食品支持;四是作为城镇劳动力生产与家庭再生产的“拆分”场所,为保证外出的家庭成员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进城务工,农业与农村承担了其家庭再生产的责任。在上述功能发挥基础上,我国城镇化才得以以低成本、高速度、超稳定的状态持续推进,而这些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收缩性发展的积极实践,乡村还需要继续充分激活并完善农业与农村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功能,为未来的城镇化持续贡献力量。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收缩来解释中国式农业与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所经历的去“过密”转型过程,将乡村收缩作为城镇“扩张”的一体两面,进而认识到以收缩作为乡村发展内生路径的本土化路径,避免以“终结论”“衰败论”来看待乡村经历的人口总量减少和人口结构性变动。伴随着城镇扩张的过程,乡村会经历收缩的不同阶段,而在恰当的阶段开展积极干预,有助于实现乡村收缩性发展。在此意义上,收缩本身就是一种良性的发展,这是本文提出收缩性发展框架的原因之一。而伴随着乡村收缩,原有的“过密”状态得以纾解,乡村内部已经围绕走出“过密”的资源结构展开了新的经济均衡,并在可预见的将来进一步形成再调适和新均衡。而如何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建构富含韧性和潜力的资源结构,是本文提出收缩性发展框架的原因之二。在收缩性发展理念指导下,乡村振兴实施方略上应集中、合理地投放资源,不以还原“完整”乡村为目的,不开展大拆大建式硬件建设,而是以在村人群需求为基础,积极回应村群体的日常生活需要,以生活治理来保障村群体生活圈的完整;以产业治理来打造乡村发展的潜能结构,让村群体更方便地发展种养业,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并发展生产性服务;通过乡村内生性治理传统来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简约治理,避免高能耗的治理方式对乡村资源的耗散;通过文化治理来重焕乡土文化、涵养村落传统生机,使村群体在熟悉的共同体文化中安身立命。

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与我国规模相当的乡村收缩与人口流动现象,面对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基于各地的创新实践开展“中国方案”探索具有必要性。有学者预计,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提高,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70%,2050年将达80%<sup>①</sup>。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农村人口占比还将进一步下降,城镇化进程还将持续推进,而乡村也将持续收缩。乡村收缩并不必然是发展的阻力,利用好政策环境和内部条件,收缩也可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未来城镇化率即使达到80%的高水平,仍意味着还有2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需要以积极收缩来应对进一步的乡村收缩,依靠收缩性发展来承担促进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的重任。本文在借鉴城市收缩、精明收缩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乡村收缩性发展的理念与基层治理框架,也基于部分微观实践经验,尝试提炼以收缩性发展为衡量尺度的基层治理创新路径,以丰富收缩性发展的理论内涵,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责任编辑:邓 帅]

<sup>①</sup> 魏后凯:《高质量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城市问题》2024年第5期。